

日刊刊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理事长木村一三谈话纪要

## 《亲眼看到的华国锋体制下的中国》

【本刊讯】日本国策研究会发行的《新国策》旬刊，四月二十五日刊登该刊采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理事长、国际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木村一三的谈话纪要，题目是《亲眼看到的华国锋体制下的中国》，摘载如下：

华先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  
具有超群的力量

从结论说，我认为华体制的稳定性是毫无怀疑的余地的。首先，从华先生本人的才能来说，他沉着、冷静，而且不失时机地、果敢地粉碎了江青等“四人帮”不纯分子；同时已在努力纠正和肃清“四人帮”所造成的后遗症。无论从这种做法来说，还是从为推进革命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进行的方法来说，华主席都表现出了超群的政治力量。他作为革命政治家，原则性强，具有卓越的见识。他在粉碎“四人帮”中表现了优秀战略家的决断能力。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扎实的领导能力。所有这些，再加上他气魄大，为人谦虚，因而身孚众望。中国的领导人、老干部以及普通群众都承认，华国锋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最适于作接班人的领导和领导人，他们为有了“英明的新主席”而感到自豪。

有人说以华先生为首的党中央“经验不足”。

\*\*\*

但是，他在作为将来接班的候选人而被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于一九七一年提拔到中央以前，管理过地方二十余年，包括任湖南省最高负责人的经验在内，经验是极为丰富的。而且，他五十六岁，正好干事，因此大有希望。

华国锋先生气魄大，他作为革命家的尖锐性和决断力，在同“四人帮”斗争的决定性瞬间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把“四人帮”借以依靠的根据地“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人帮”的心腹）召到北京，正面说明了被捕的“四人帮”的情况，并没有逮捕这个“四人帮”的心腹，而是让他依旧返回上海，让他做善后工作。从北京火急地赶回上海的“四人帮”的代理人，召开了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会议，还在隐瞒“四人帮”已被逮捕这个事实的期间，上海群众便从邻近城市和其他省得到消息，行动起来了。最终，“四人帮”曾夸下海口说可以马上动员三十万名武装民兵的、他们的最大的据点上海，没打一枪，没流一滴血，就完全解决了。

“四人帮”最大的据点上海如此，全国的形势便可想而知了。日本报纸刊登消息说，好几个地方发生了争端，这是一种错觉，把北京政府在逮捕“四人帮”后发表的“四人帮”曾经插手的一些地区的状态，当作是各地由于逮捕“四人帮”而发生的争端。

## 塔斯社道 门格斯图抵苏同波德戈尔内等会谈

合众国际社说埃塞俄比亚军队将改变原来依靠美国武器的局面转而谋求苏联增加军事援助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四日电】苏联—埃塞俄比亚会谈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参加会谈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部长会议主席门格斯图、中校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

双方就本国的内、外政策问题相互介绍了情况，着重讨论了捍卫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革命成果使其免受内外反动势力阴谋诡计危害的问题。

双方详细地讨论了苏埃关系的广泛问题，并且满意地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社会问题为在双边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创造了良好前提。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五日电】苏埃会谈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结束。

双方对会谈时取得

的结果表示满意，重申都愿意发展并加强苏埃友谊与合作。

讨论国际形势时，重点讨论了加强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及在同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斗争中，在争取确立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内政的权利的斗争中，使和平与进步力量联合起来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四日电】西方外交官们说，预料门格斯图将谋求苏联增加军事援助，以改变埃塞俄比亚军队原来依靠美国武器的局面。

卡特政府停止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理由是埃塞俄比亚军政权侵犯了基本人权。门格斯图于是下令关闭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五处设施并驱逐其人员。

外交官们还指出，

门格斯图可能会在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就前法国领土吉布提的前途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中，谋求苏联的支持和影响。

西方观察家们还指出，苏联同埃塞俄比亚日益发展关系，将会给苏联人同索马里的原先的亲密关系带来困难，索马里已允许苏联人自己配置人员使用亚丁湾上至关重要的伯贝拉海军设施。

## 外电报道埃塞俄比亚准备进攻厄游击队

【合众国际社亚的斯亚贝巴五月三日电】至少有一百一十五辆满载着农民的陆军卡车和公共汽车今天从亚的斯亚贝巴向北驶去，显然是为了加入约有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日益庞大的农民军。外交人士说，预料军方将利用这支军队在人民战争中粉碎厄立特里亚脱离主义运动和其他的国内反对派。

【路透社莫斯科五月四日电】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门格斯图今天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谈，以探索进一步密切对苏关系的前景。埃塞俄比亚上月中断了同美国的二十年军事同盟。

观察家们说，他们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美国停止对埃塞俄比亚提供军火，莫斯科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军火的不足。

西方报纸曾有消息说，苏制坦克和苏制其他武器是从亚丁运送给埃塞俄比亚的。

门格斯图现年三十五、六岁。他显然是得到克里姆林宫赞赏的。

厄立特里亚脱离主义运动和其他的国内反对派。

【合众国际社开罗五月四日电】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今天说，埃塞俄比亚政府打算在今后几天内对谋求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人发动一场毁灭性战争，并呼吁世界给予帮助。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五日电】

题：卡特启程前往欧洲访问前发表的讲话全文

卡特总统在就职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前发表的讲话中认为，他前往欧洲会晤北约组织国家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为期五天的访问，将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卡特五月五日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一次简短的告别仪式上说：“我认为取得成功的前景是良好的，而且相信，在我结束这次为期五天的旅行回国时，我们同我国最亲密的友邦的领导人已在处理世界问题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

卡特临行前讲话的非官方文本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这是一次重要的旅行。这是我计划在今年全年到国外进行的仅有的一次旅行。在我们面对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我们在日本、加拿大和欧洲的朋友和盟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讨论经济问题的目的将是使全世界的人民重新努力制止通货膨胀迅速掠夺人民的情况，适当地和公平地共同使用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原料和其他供应品，并同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分享上帝给予世界的恩赐。

我们将就密切政治上的相互关系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和我们较密切的盟国及法国进行磋商。我们将处理有关北约组织、欧洲的防务、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

我将与十几位外国领导人进行双边的秘密商谈。我感到人们向我充分地介绍了情况并充分地进行了准备工作。而且，我本人希望，我能够很好地和真正地去美国人民将希望他们的总统在与世界上其它领导人讨论世界问题时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将努力实现我们在下列问题上的长远目标：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实现核裁军；减少常规武器的出售额；防止向现在尚未拥有进行核爆炸能力的国家扩散这种能力；讨论如何适当地使用能源；与其它国家共同发展世界贸易；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和直接援助；建立能够继续进行这种讨论的基本的制度，不仅在最高级会议这种特殊的场合上而且继续不断地在日常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讨论。

## 卡特抵伦敦参加七国首脑经济会议

【美联社伦敦五月五日电】美国总统卡特今晚坐飞机到达伦敦，同非共产党世界的一些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在周末开一次最高级会议。

他将去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些历史圣地参观，然后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七日和八日）代表“七国首脑会议”中的一个国家坐下来开重要的会议。

英国工党政府的卡拉汉首相迎接了卡特。卡拉汉说，他代表欧洲大陆欢迎卡特。

卡特说：“英国是我出国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这并非偶然，因为历史的纽带始终把美国和英国联结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之中。”

【美联社伦敦五月五日电】美国总统卡特今天到达这里，这是他举行国际首脑会议的办法开展外交活动的第一次尝试。他说，他带来了“新的倡议”提交会议讨论，以便使人们行动起来，并制止“通货膨胀大肆掠夺人民”的情况的存在。

他说要同盟国加强团结，讨论经济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

## 卡特启程前往西欧访问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

## 《苏联人对美国政策更加持批评态度》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二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利斯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人对美国政策更加持批评态度》，摘要如下：

在苏联今年传统的五一劳动节，既有阳光又有乌云。万里晴空阳光灿烂，但在缓和问题上却在积聚着乌云。

在五光十色的壮观节日背后，苏联同美国的关系正在慢慢恶化。

下面是这里看到的一些迹象：

——克里姆林宫在一些方面加强了对美国的批评，这些没有哪一个新的，但对每一方面的批评都表明，对卡特总统同莫斯科打交道的方式继续深感不悦。

这些方面包括卡特的预算要求对“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提供更多的经费并加强它们的发射功率。

【路透社波恩五月五日】西

德政府官员今天说，他们逮捕了一名在施密特总理办公室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共产党间谍嫌疑分子。

这是从仅在三年前揭露了东德特务纪尧姆

华盛顿最近拒绝给一个苏联工会领导人代表团颁发签证，以及有两个人继续呆在美国。这两人七年前杀害了一位机上女服务员，劫持一架飞机去土耳其。苏联人要求归还这两个人，以交付审讯。

——这里的西方外交家说，五月十一日在日内瓦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意味着象美国巡航导弹或者苏联逆火式轰炸机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将会出现突破。正如这里所描绘的那样，将要讨论的问题相对来说都是一些小问题——虽然人们仍希望，就更广泛的问题最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一些小问题上仍在不断地搞一些令人烦恼的小动作，这些动作有时可暗示出整个气氛。比如，就美国外交官们在自己的寓所里

放映《日瓦戈医生》一事，向美国大使马尔科姆·图恩重新提出了抗议。苏联外交部也因一些苏联官员被邀观看此电影而抱怨。图恩拒绝了这些抗议，理由是这些抗议是对大使馆内部事务的不正当干涉。

在一些主要报纸对卡特支持“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之后，苏联外交部四月二十九日向使馆政务参赞威廉·布朗正式提出意见书，布朗拒绝了这项意见书。苏联人说拒发给他们工会代表团签证就是不执行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是一种虚伪的行

为。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苏联人士都强调他们对劫持者（父子两人，他们的名字叫普拉加斯·勃拉津斯卡斯和阿尔基尔达斯·勃拉津斯卡斯）感到何等气愤。

与此同时，此地的分析家指出了美苏关系中一个积极的迹象：苏联人对那些今年二月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一直一言不发，这次逮捕曾促使卡特支持人权事业，并使苏联反对卡特进行干涉。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奥尔洛夫和金兹伯格仍被拘留待审。卡特最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也未作任何公开的讲话，这使得这里的某些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苏双方眼下都在设法使这个问题消沉下去。

## 在丹麦的二十七名波兰人到西德使馆要求避难

【合众国际社哥本哈根五月三日电】前来丹麦观看五月一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二十七名波兰人，今天前去西德大

使馆要求在德国避难。大使馆后来把他们送到一个保密的地方。

大使馆发言人德班克今晚说，“这些波兰人已不在我们手中，已送往一个保密的和更为舒适的住所。我们希望在两天后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细节”。

早些时候，大使馆的另一名发言人德泽说，大使馆正在等待指示。他说，“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我们等待波恩的命令”。

## 西德逮捕一名东德间谍嫌疑分子

以来，第一次把总理府的间谍案件公之于众。

总理府负责人许勒尔对这里的记者说，这位嫌疑间谍（三十岁）是一位秘书，叫卡利格

·舍夫勒。她在总理办公室的将近全部时间都是在与欧洲共同市场打交道和处理波恩政府同西欧各个国家的关系的这样一个部门工作。许勒尔说，她可以接触到被列为“秘密”的材料。

## 《布拉格为何不能平息持不同政见者的呼声》

说捷存在地下政治反对派，但有这样乡的政治集团和个人在人权问题上联合起来，则还是第一次，这对依靠苏联坦克掌权的政府来说，是个真正的政治威胁

（上周有一千多人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七七宪章发言人之一、六十九岁的扬·帕托奇卡教授的葬礼，显示了广大公众对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人权运动的支持，帕托奇卡教授是在警察连续讯问之后患脑溢血而死的。肖克罗斯和卡万阐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如何造成捷克当局前所未有的问题。——原编者按）

自从俄国人在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摧毁改革运动以来，政治自由和辩论受到了压制。大约有五十万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的数十万支持者被解职，他们的子女不能进一步受教育。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种镇压并不太引人注目，但它是不间断的。也是失败的。

去年十一月，捷克政府全文公布了联合国关于人权和文化权利的公约，确认它们是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这些文本在书店里几天之内就卖光了，这个政权的许多反对者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机会来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差别。一月一日，一个由二百四十二人组成的自称为七七宪章的小组宣布，他们打算定期向政府报告国家的法律遭致违背的情况。

这个小组里包括前党的高级官员，如杜布切克时期的外交部长哈耶克；杜布切克时期的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一九六八年中央委员会书记

姆利纳日。它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如国际著名的剧作家哈维尔，哲学家帕托奇卡教授，极“左”的托洛茨基分子如乌赫尔，及基督教民主党人。

这种联合是前所未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存在地下政治反对派，但是这样多的政治集团和个人在人权问题上联合在一起，则还是第一次。他们没有思想纲领，但是对那个在苏联入侵后九年来一直靠苏联坦克掌权的政府来说，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威胁。

这个政权的反应比宪章分子预计的要强烈。哈维尔现在狱中，哈耶克实际上被软禁在家中，而帕托奇卡已死。

宪章实际并未公布；光是在报纸上谩骂宪章的支持者，但是据宪章分子所说，数以万计的宪章的抄件，在一九六九年起所建立的、组织得很好的地下网中传阅，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至今，有六百三十一人公开签署了宪章，还有数以百计的人默默地表示支持。三月九日发表的最近的一百八十人名单中，有八十四个工人，四十三个技术人员或白领工作者。显然，这个运动不象当局所宣称的那样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集团。

政府在全国各工厂组织群众集会谴责宪章分子。这些会议并不都是成功的。诸如布拉格台斯拉电器厂、布拉格捷卡德机车厂和翻砂厂、在列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同舟七人》的社论，摘要如下：

今天，卡特总统将要飞往伦敦，在那里，他将会象大多数访问者那样发现，目前的焦虑情绪比在美国的焦虑情绪大得多。

领导欧洲政府的那些人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们保卫最起码的国家利益。在六十年代长期的兴旺时期确定的共同目标的远大理想已经束之高阁。现在同以往一样，困难时期使人产生分裂。在这个代表世界工业大国讲话的紧密的七人——两个北美洲人、一个亚洲人、四个欧洲人——小集团中，卡特先生是个新来的人。其他六个人可能对他有点疑心。当开始筹备这次会议时，他坚决站在有大量赤字的那些国家一边，他们要求西德人加快经济发展和帮助别人的出口。此后，卡特改变了主意。他接受了德国的立场，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大威胁。这使他们更加倾向于对不得不对来自邻国的进口货采取歧视措施这种令人遗憾的可能性发出大声的怨言。

当卡特先生放弃象征性的五十美元退税时，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从致力于加快美国和全世界的企业活动的立场上后退了。他同德国人一起承认经济无限期地低速发展的极大可能性。在本周末的伦敦会谈中，其他六个人无疑将会巧妙地请他进一步探讨这种阴郁的前景。如果美国不想采用减税和退税等手段来扩大经济的习惯做法，那么可采取德国的办法。德国已决定坚决把他们的盈余不断地借给他们的人不敷出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主顾，使他们的市场保持开放和避免政治灾难。美国是否也会不断贷款给别人呢？

在伦敦的七个人将会紧紧抓住一个重要的真理，即起作用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对生活水平的最后影响。当卡特同四个欧洲人谈话时，他无疑会想到，他们都有两件共同的事情。他们在国内地位都在下降。在经济停滞的时候，工作是很出色，因为一切事情都不断地同食品帐单联在一起。如果卡特总统能够使其他六国政府相信，他和他的政府将是这种不祥之兆的规则例外，他此行就是大有收获的。卡特先生在同他的六个新朋友同乘的一条船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特夏尼的阿维亚轻型飞机厂、克拉德诺钢铁厂、拉多津水泥厂的工人，都要求一种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要听听宪章的全文再决定是否谴责

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中心——比尔森，工人们印制秘密传单，要求释放在狱中的那些人，并强调宪章关系到每一个“希望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享受”的人。

从一月起，宪章分子提出了两个详细说明人权遭到践踏情况的文件。一份是谈工作条件，另一份是谈那些仍象一九六八年那样支持杜布切克的人的子女遭到的歧视。还涌现出其他一些非正式的小组。

宪章运动及对该运动的镇压，开始影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关系。其他东欧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对它表示支持。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共产党也都表示支持，它们的报纸——《团结报》、《人道报》、《晨星》经常被禁止在布拉格发行。上个月，有十一名前捷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呼吁西方的同志给予经常的和具体的支持。

这个问题不大可能逃脱，因为在六月份，赫尔辛基宣言的所有签字者将在贝尔格莱德开会讨论宣言两年来的执行情况。所有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将利用这次会议，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条约中的“人权”条款上。

宪章的支持者主张西方政府应彻底检查一下在人权方面的取得的进展，并揭露在东方和西方侵犯人权的情况。

首美  
脑报  
会议  
社评  
论七  
国《同  
舟  
七  
人》





## 港刊文章《伊文思、罗丽丹——〈愚公移山〉》

说这部纪录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片去年在巴黎首映时，轰动一时，后来继续在

法国各地及比利时放映，十分受欢迎；最近在瑞典电视荧幕上与更多观众见面了

第八部影片纪录了山东省一个渔村的生活。

在那里，渔民们除了象其他渔民一样出海捕鱼外，还在沿岸养殖了营养丰富的海带。象

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一样，他们在工作之余也常常讨论政治社会问题。他们讨论的除了一般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外，更特别讨论怎样利用他们学来的理论去实际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伊文思和罗丽丹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很着重地探索和描述的。他们访问了这个渔村里的妇女捕鱼队。这些妇女们都很能干，而且自信、乐观。

第九部是关于著名的大庆油田。但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采油工业，还有大庆的人自力更生的具体表现。瑞典《每日新闻》报驻北京的记者最近曾到大庆参观，其后写了两篇报道，批评大庆的住房落后，生活水准使他失望。大庆的生活水准远低于瑞典一般的水准，这确是事实。但是，大庆的迫切目标不是在于提高当地工人生活，而是首先为了全国的需要。若不了解这一点，当然就会觉得大庆令人失望了。

第十部是关于杂技的，与第六部关于京剧的相似。

第十一部是关于上海第三电工厂工人的生活。我们除了看到他们的工作情形外，也看到他们工余的活动，体会到工人与干部的关系等等。其中使人印象尤深的是工人开会讨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瑞典工人看见中国工人在余暇学习英语、绘画等，觉得与他们在瑞典的情况很接近；但当他们看到中国工人竟头头是道地谈哲学理论时，他们就觉得茫然了。

压轴戏是关于上海一家药店的纪录片。观众们不但认识了药店里的大致情况，卖什么药，怎样服务等，就是连药店里的每一位职员，每一位干部，他们的家庭和个性等，都有头绪了，有时连来买药的人也生动真切地活在观众的脑海中。在上海药店里，他们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其中一位年轻的男职员“抢”了不少“镜头”，因为他容易发脾气，顾客一有意见，他就火了。他后来受到批评。同事在会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只说是一个较胖的、戴眼镜的小伙子。他自己就笑着说：“一定是我了。”他自辩说，那人要买的东西根本没有，怎卖给她呢？同事们向他解释说，是他的工作态度不好，不但没有尽力替顾客找她需要的药物，而且还对她发脾气。他接受了批评，虽然还是有点不服气似的。这部影片还介绍了一个附设在药店隔壁的小诊疗处。过路的人，如果不舒服，可以到那里去吃点药，或扎绷带等。

一点评价 在瑞典电视台负责介绍这十二部影片的斯文森女士说：“伊文思是一位热情仰慕中国的人，但他从不把中国的思想体系强加在我们的头上。”

就如斯文森女士说：“这些影片里，没提过一个统计数字，也未包含着什么戏剧性的头条新闻之类的题材；我们见到的是八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是的，重要的就在日常：这一见一闻，使人们觉得中国人并不那么异乎寻常。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基本上也和所有人类一样，有思想，有情感，会劳动，会创作，有说有笑，要穿要吃，会哭，也会争吵，也有脾气，既不是“好得不可人信”，也不象反华宣传中的中国人那么丑恶或神秘。反过来，他们都是友善而开朗的，总的气氛就是一个家庭般的，有不同的意见，但也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共同建设。这样，一些因为对自己的社会深感失望而醉心向往中国的西方人也就明白了，在中国也有矛盾，也有困难，只是矛盾要解决，困难要克服，愚公在移山，中国不是乌托邦，中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怀疑的人，也渐渐领悟到，中国人民享有一种自由，使他们活得有意思，同时又能放怀欢笑，面孔是健康活泼的。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刊登一篇寄自北欧的文章，题为《伊文思、罗丽丹——〈愚公移山〉》，摘要如下：

《愚公移山》去年

在巴黎首次公映时，轰动一时；后来继续在法国各地及比利时放映，十分受欢迎。最近，《愚公移山》到了瑞典，在电视荧幕上与更多的观众见面了。

《愚公移山》是一套十二部有关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题为（一）《一个妇女——一个家庭》（二）《手工艺》（三）《从一个城市来的画面——上海》（四）《一个皮球的故事》（五）《一个军营》（六）《北京的剧院》（七）《一位教授》（八）《在山东省的一个渔村》（九）《大庆油田》（十）《杂技》（十一）《一间工厂——上海第三电工厂》（十二）《在药店里》。

《愚公移山》原是中国古书《列子》里的一个寓言故事，后来毛泽东用它来比喻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现在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制作者伊文思又引申了毛泽东的比喻，借用这句成语来介绍中国亿万“移山的愚公”。

瑞典电视第一台在今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八日放映了这十二部影片。

“纪录片先锋”伊文思 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今年七十八岁。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纪录片的制作分不开的，他的制作占了纪录片历史的重要部分。他小时候，家里有一部老式电影摄影机，是他父亲用来拍摄家庭电影的。这对少年的伊文思，不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激发了他对电影制作的浓厚兴趣。他至今还好好保存着这部“老古董”。

中学毕业后，伊文思勉强听他父亲的话，上大学去念商科，但象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个不善于做生意的人，所以离开了商业学院，最后改行拍电影，拍的都是纪录片，从现实中取材。他热爱生活，对人物很感兴趣，特别想利用镜头来反映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情况；起初都是就地取材，在荷兰工厂等地方拍摄一些工人生活的电影，当时还是默片时代。他这种对人类的关心，使他对当时的苏联存有希望。一九二八年，他到莫斯科，拍了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十年后的苏联的纪录片。不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伊文思对苏联表示了极度的失望。幸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伊文思认为，尤其文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更提高了。他说，他的哲学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动，没有任何东西是停滞的。

伊文思有“纪录片先锋”之称；他的成名作可说是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跟着国际志愿军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此外，他到了延安，拍摄中共和中国人民抗日的纪录片。越战期间，他又到越南去，利用他的电影技术与艺术，揭露了越战的实情。最近，他以从事电影制作五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到中国拍摄了《愚公移山》，效果的圆满，使欧洲的影评家说，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事业的冠冕。他本人没有自己事业圆满结束的想法，他同情一切为反抗压迫、抵抗侵略而行动的人；他支持为正义而斗争，景仰为实现以自己笃信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人：他报道过中国人民的抗日，他报道了中国的今天。

一九三〇年代后期，伊文思到中国去报道日本的侵华，其间认识了好几位现时的中国领袖人物，和周恩来做了朋友。离开中国前，他把他当时用的电影机留下来，赠送给中国人民。中共军队用这部摄影机拍摄了不少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录片。这部电影机今天陈列在北京革命博物馆里。

一九七三年，伊文思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讲学，并得到允许，到中国任何地方去自由地拍摄纪录片。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较年轻的法国女电影制片家罗丽丹。周恩来要求伊文思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他们准备用四个月的工夫，

拍摄一部长约三个钟头的电影。但他们一九七三年到了中国以后，一住就是整整三年，其间到过许多地区，看过许多部门，接触了许多人物，结果拍出了一百二十个钟头的电影，全部都是他们两人自费的。整理后公映的十二部影片，全长共十二个钟头，只是原来胶片的十分之一。这十二部影片，各部长短不同，长的达两个钟头，短的不过一刻钟；但每部都是独立的；合起来就从各方面反映了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发展中国家的精神与物质面貌。

《愚公移山》的内容 《愚公移山》的第一部，主要是介绍北京城外一间钢铁厂里的女工高树兰（译音）。

高树兰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伊文思和罗丽丹除了直接介绍她以外，还间接让她在工作岗位上的同伴们来刻画她的形象。他们说的都是赞赏她的话。男的，女的，年长的，年轻的，都认为她为人热情，又够干劲，敢想敢说敢为，甚至有些男人干不来的活，她也负起了，实在是个好工人好干部。那么她有什么短处呢，能批评她吗？差不多人人都笑着说：“她是一位好同志，就是工作方法简单一些。”这部影片长一小时四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观众不知不觉地深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看到了中国妇女的地位。

第二部影片只占二十分钟的时间，见到的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如象牙雕刻，粉团塑像和羽毛贝类画。这些作品有声有色，贝壳造的孙悟空腾云驾雾，牙雕的长城与其他古代世界奇迹一齐玲珑浮突于眼前，通过了民族传统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国际主义的内容。

第三部影片拍的是上海市。在中国来说，上海的交通是极繁忙的，汽车特别多，自行车就不用说了。在这部影片里，除了访问部分，旁白也是极少的，听到的是上海的真实的声音，人们在街上的语声，车辆在路上的响声等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只，有外国船，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最令观众一新耳目的是中国制造的巨轮“风浪号”的下水礼，张红挂彩，锣鼓齐鸣，人民尝到自力更生的甜果。

第四部最受欢迎，许多瑞典朋友谈到《愚公移山》时都提及“那一脚足球”。这部叫《一个皮球的故事》的影片长不过十五分钟。开始的时候，是一所学校早上响铃上课时操场上的情景：一位女教师走过来，看见几个男生听到上课铃声还在那儿踢球，就叫他们停止踢球，进教室去。但其中一个学生，不但没停，还加踢一脚，而皮球又恰好落在老师身上，于是师生两方，就这事件开会讨论。踢球的学生道出事情经过，同学们有指责他不是的，也有为他作辩的。讨论了好一会，老师的态度是“治病救人”，宽大地告诉同学们以后要守纪律，不要被“球瘾”所误了。于是师生之间达到了谅解，错误也得到改正；课堂内的气氛由始至终都是没有敌意的，至此就更融洽了。

在短短的一刻钟里，观众可以体会到中国教育很重要的一面：大家开展了批评和反批评，同时又允许犯错误，更允许改正错误，没有抑制和隐瞒。在政治思想、社会哲学来说，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是进步的。

第五部——《一个军营》——让观众看到一个人民军队的生活。

第六部也较短，特别的地方，是不单拍摄北京的剧院，或什么全套的演出，而是拍摄北京京剧演员排演《龙江颂》时的片段经过和期间的讨论。最后特别加映了用北派武术来表现江水浪涛的一段，比传统京剧《大闹水晶宫》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受瑞典群众的赏识。它具体地说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方针。

第七部影片也只长十五分钟，是钱教授叙述他个人对文革的体验。

## 港刊文章《伊文思、罗丽丹——〈愚公移山〉》

说这部纪录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片去年在巴黎首映时，轰动一时，后来继续在

法国各地及比利时放映，十分受欢迎；最近在瑞典电视荧幕上与更多观众见面了

第八部影片纪录了山东省一个渔村的生活。

在那里，渔民们除了象其他渔民一样出海捕鱼外，还在沿岸养殖了营养丰富的海带。象

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一样，他们在工作之余也常常讨论政治社会问题。他们讨论的除了一般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外，更特别讨论怎样利用他们学来的理论去实际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伊文思和罗丽丹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很着重地探索和描述的。他们访问了这个渔村里的妇女捕鱼队。这些妇女们都很能干，而且自信、乐观。

第九部是关于著名的大庆油田。但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采油工业，还有大庆的人自力更生的具体表现。瑞典《每日新闻》报驻北京的记者最近曾到大庆参观，其后写了两篇报道，批评大庆的住房落后，生活水准使他失望。大庆的生活水准远低于瑞典一般的水准，这确是事实。但是，大庆的迫切目标不是在于提高当地工人生活，而是首先为了全国的需要。若不了解这一点，当然就会觉得大庆令人失望了。

第十部是关于杂技的，与第六部关于京剧的相似。

第十一部是关于上海第三电工厂工人的生活。我们除了看到他们的工作情形外，也看到他们工余的活动，体会到工人与干部的关系等等。其中使人印象尤深的是工人开会讨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瑞典工人看见中国工人在余暇学习英语、绘画等，觉得与他们在瑞典的情况很接近；但当他们看到中国工人竟头头是道地谈哲学理论时，他们就觉得茫然了。

压轴戏是关于上海一家药店的纪录片。观众们不但认识了药店里的大致情况，卖什么药，怎样服务等，就是连药店里的每一位职员，每一位干部，他们的家庭和个性等，都有头绪了，有时连来买药的人也生动真切地活在观众的脑海中。在上海药店里，他们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其中一位年轻的男职员“抢”了不少“镜头”，因为他容易发脾气，顾客一有意见，他就火了。他后来受到批评。同事在会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只说是一个较胖的、戴眼镜的小伙子。他自己就笑着说：“一定是我了。”他自辩说，那人要买的东西根本没有，怎卖给她呢？同事们向他解释说，是他的工作态度不好，不但没有尽力替顾客找她需要的药物，而且还对她发脾气。他接受了批评，虽然还是有点不服气似的。这部影片还介绍了一个附设在药店隔壁的小诊疗处。过路的人，如果不舒服，可以到那里去吃点药，或扎绷带等。

一点评价 在瑞典电视台负责介绍这十二部影片的斯文森女士说：“伊文思是一位热情仰慕中国的人，但他从不把中国的思想体系强加在我们的头上。”

就如斯文森女士说：“这些影片里，没提过一个统计数字，也未包含着什么戏剧性的头条新闻之类的题材；我们见到的是八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是的，重要的就在日常：这一见一闻，使人们觉得中国人并不那么异乎寻常。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基本上也和所有人类一样，有思想，有情感，会劳动，会创作，有说有笑，要穿要吃，会哭，也会争吵，也有脾气，既不是“好得不可人信”，也不象反华宣传中的中国人那么丑恶或神秘。反过来，他们都是友善而开朗的，总的气氛就是一个家庭般的，有不同的意见，但也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共同建设。这样，一些因为对自己的社会深感失望而醉心向往中国的西方人也就明白了，在中国也有矛盾，也有困难，只是矛盾要解决，困难要克服，愚公在移山，中国不是乌托邦，中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怀疑的人，也渐渐领悟到，中国人民享有一种自由，使他们活得有意思，同时又能开怀欢笑，面孔是健康活泼的。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刊登一篇寄自北欧的文章，题为《伊文思、罗丽丹——〈愚公移山〉》，摘要如下：

《愚公移山》去年

在巴黎首次公映时，轰动一时；后来继续在法国各地及比利时放映，十分受欢迎。最近，《愚公移山》到了瑞典，在电视荧幕上与更多的观众见面了。

《愚公移山》是一套十二部有关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题为（一）《一个妇女——一个家庭》（二）《手工艺》（三）《从一个城市来的画面——上海》（四）《一个皮球的故事》（五）《一个军营》（六）《北京的剧院》（七）《一位教授》（八）《在山东省的一个渔村》（九）《大庆油田》（十）《杂技》（十一）《一间工厂——上海第三电工厂》（十二）《在药店里》。

《愚公移山》原是中国古书《列子》里的一个寓言故事，后来毛泽东用它来比喻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现在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制作者伊文思又引申了毛泽东的比喻，借用这句成语来介绍中国亿万“移山的愚公”。

瑞典电视第一台在今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八日放映了这十二部影片。

“纪录片先锋”伊文思 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今年七十八岁。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纪录片的制作分不开的，他的制作占了纪录片历史的重要部分。他小时候，家里有一部老式电影摄影机，是他父亲用来拍摄家庭电影的。这对少年的伊文思，不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激发了他对电影制作的浓厚兴趣。他至今还好好保存着这部“老古董”。

中学毕业后，伊文思勉强听他父亲的话，上大学去念商科，但象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个不善于做生意的人，所以离开了商业学院，最后改行拍电影，拍的都是纪录片，从现实中取材。他热爱生活，对人物很感兴趣，特别想利用镜头来反映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情况；起初都是就地取材，在荷兰工厂等地方拍摄一些工人生活的电影，当时还是默片时代。他这种对人类的关心，使他对当时的苏联存有希望。一九二八年，他到莫斯科，拍了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十年后的苏联的纪录片。不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伊文思对苏联表示了极度的失望。幸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伊文思认为，尤其文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更提高了。他说，他的哲学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动，没有任何东西是停滞的。

伊文思有“纪录片先锋”之称；他的成名作可说是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跟着国际志愿军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此外，他到了延安，拍摄中共和中国人民抗日的纪录片。越战期间，他又到越南去，利用他的电影技术与艺术，揭露了越战的实情。最近，他以从事电影制作五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到中国拍摄了《愚公移山》，效果的圆满，使欧洲的影评家说，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事业的冠冕。他本人没有自己事业圆满结束的想法，他同情一切为反抗压迫、抵抗侵略而行动的人；他支持为正义而斗争，景仰为实现以自己笃信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人：他报道过中国人民的抗日，他报道了中国的今天。

一九三〇年代后期，伊文思到中国去报道日本的侵华，其间认识了好几位现时的中国领袖人物，和周恩来做了朋友。离开中国前，他把他当时用的电影机留下来，赠送给中国人民。中共军队用这部摄影机拍摄了不少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录片。这部电影机今天陈列在北京革命博物馆里。

一九七三年，伊文思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讲学，并得到允许，到中国任何地方去自由地拍摄纪录片。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较年轻的法国女电影制片家罗丽丹。周恩来要求伊文思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他们准备用四个月的工夫，

拍摄一部长约三个钟头的电影。但他们一九七三年到了中国以后，一住就是整整三年，其间到过许多地区，看过许多部门，接触了许多人物，结果拍出了一百二十个钟头的电影，全部都是他们两人自费的。整理后公映的十二部影片，全长共十二个钟头，只是原来胶片的十分之一。这十二部影片，各部长短不同，长的达两个钟头，短的不过一刻钟；但每部都是独立的；合起来就从各方面反映了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发展中国家的精神与物质面貌。

《愚公移山》的内容 《愚公移山》的第一部，主要是介绍北京城外一间钢铁厂里的女工高树兰（译音）。

高树兰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伊文思和罗丽丹除了直接介绍她以外，还间接让她在工作岗位上的同伴们来刻画她的形象。他们说的都是赞赏她的话。男的，女的，年长的，年轻的，都认为她为人热情，又够干劲，敢想敢说敢为，甚至有些男人干不来的活，她也负起了，实在是个好工人好干部。那么她有什么短处呢，能批评她吗？差不多人人都笑着说：“她是一位好同志，就是工作方法简单一些。”这部影片长一小时四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观众不知不觉地深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看到了中国妇女的地位。

第二部影片只占二十分钟的时间，见到的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如象牙雕刻，粉团塑像和羽毛贝类画。这些作品有声有色，贝壳造的孙悟空腾云驾雾，牙雕的长城与其他古代世界奇迹一齐玲珑浮突于眼前，通过了民族传统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国际主义的内容。

第三部影片拍的是上海市。在中国来说，上海的交通是极繁忙的，汽车特别多，自行车就不用说了。在这部影片里，除了访问部分，旁白也是极少的，听到的是上海的真实的声音，人们在街上的语声，车辆在路上的响声等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只，有外国船，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最令观众一新耳目的是中国制造的巨轮“风浪号”的下水礼，张红挂彩，锣鼓齐鸣，人民尝到自力更生的甜果。

第四部最受欢迎，许多瑞典朋友谈到《愚公移山》时都提及“那一脚足球”。这部叫《一个皮球的故事》的影片长不过十五分钟。开始的时候，是一所学校早上响铃上课时操场上的情景：一位女教师走过来，看见几个男生听到上课铃声还在那儿踢球，就叫他们停止踢球，进教室去。但其中一个学生，不但没停，还加踢一脚，而皮球又恰好落在老师身上，于是师生两方，就这事件开会讨论。踢球的学生道出事情经过，同学们有指责他不是的，也有为他作辩的。讨论了好一会，老师的态度是“治病救人”，宽大地告诉同学们以后要守纪律，不要被“球瘾”所误了。于是师生之间达到了谅解，错误也得到改正；课堂内的气氛由始至终都是没有敌意的，至此就更融洽了。

在短短的一刻钟里，观众可以体会到中国教育很重要的一面：大家开展了批评和反批评，同时又允许犯错误，更允许改正错误，没有抑制和隐瞒。在政治思想、社会哲学来说，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是进步的。

第五部——《一个军营》——让观众看到一个人民军队的生活。

第六部也较短，特别的地方，是不单拍摄北京的剧院，或什么全套的演出，而是拍摄北京京剧演员排演《龙江颂》时的片段经过和期间的讨论。最后特别加映了用北派武术来表现江水浪涛的一段，比传统京剧《大闹水晶宫》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受瑞典群众的赏识。它具体地说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方针。

第七部影片也只长十五分钟，是钱教授叙述他个人对文革的体验。